

孔廟與乾隆朝祭器的設置

吳曉筠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提 要

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反思明代祭器制度，並延續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復古祭器，進行遵古改造皇朝祭器，並載於《皇朝禮器圖式》。在檢視相關資料時，發現這些號稱依據周代儒家禮儀經典而來的器形，與今日所認知的周代器物，或宋代仿古禮器、金石圖譜著錄的三代器物有明顯差異。這一時期也恰為乾隆皇帝整理內府古銅器並開始編修《西清古鑑》，但卻無明確參考內府周代青銅器形制製作祭器的現象。乾隆皇帝改制祭器所遵循的古代為何？充斥宮廷的三代彝器是否曾對祭器或祭儀產生影響？是本文欲探討的問題。

本文分析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的祭器及乾隆皇帝的遵古改造祭器，提出遵古祭器所依循的古代，是由儒家經典的文字說明闡釋意義，廟學脈絡汲取古代祭器意象，再參酌明代禮器，並加入部分當代創新。另一方面，對曲阜孔廟的關注，也帶來了將周代銅器置入皇帝親祀孔廟的改變。本文追索乾隆皇帝頒賜孔廟的三套銅器的配置過程，說明內府的古代銅器鑑賞知識及陳設方式如何影響了三套銅器的器類選擇、配件製作，進而改變了釋奠祭器陳設的面貌。

關鍵詞：乾隆皇帝、祭器、古銅器、孔廟

一、前言

儒學在中國文化史乃至整個東亞文明，具有核心的地位。因此，符合儒家所崇奉的周代禮儀及禮器，以及對禮教的推行，一直是不同時代的政治焦點。也因此，什麼造型的器物是合乎禮法的祭儀禮器，也是各朝代思考的重要問題。乾隆皇帝也不例外，自其即位之初，乾隆元年（1736）即命大臣編纂《欽定三禮義疏》，並思考各種儀典及禮器的呈現。¹與之相關的是乾隆十二年（1747）詔令進行祭器改革，²最終成果展示於二十四年（1759）敕纂、三十五年（1770）完成的《皇朝禮器圖式》卷一、二〈祭器〉。³書中的文字說明極尊崇《周禮》、《儀禮》、《禮記》等等周代儒家禮儀經典，模仿推敲周代禮器的形制以製作當朝禮器。

在《皇朝禮器圖式》〈祭器〉中，繪製了璧、琮、珪、爵、登、簠、簋、銅、尊、豆、琖、籩、筐、俎等十四種載於古代禮書的器類。這些器類多採同一造型，爵與尊有較多變化。璧、琮、珪為玉質，籩、筐、俎均以竹木製作。其他器類以瓷質為主，少數依祭祀對象有所區別，如文廟祭器主要為銅質。爵的材質多元，有陶質、瓷質、銅質、玉質等，更有如匏爵以混合材質製作。尊的造型多樣，如太廟使用的尊，即包括了造型各異的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和山尊等五種。各壇廟及正、配位的區別及階序差異，則是通過不同的顏色、數量、材質，及使用的器類來區別。

除《皇朝禮器圖式》，另有相同內容的彩繪〈祭器圖〉冊頁，如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備物昭誠」祭器冊頁，及英國維多利亞與雅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的祭器冊頁。祭器實物散見於兩岸故宮、北京各廟壇公園及海內外公私收藏。⁴2019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也得到了一批頗為可觀的典藏。⁵這些資料提供了乾隆朝祭器的完整樣貌，吸引許多學者投入研究。如王光堯分析瓷

1 感謝學友林士鉉教授分享乾隆皇帝命纂三禮《義疏》與禮制改革的關係。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2（清）允陶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卷75，頁25。相關討論參見張小李，〈略論清代太廟祭器、祭品陳設規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年3期，頁67。

3（清）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1、2。

4 現典藏於北京天壇公園管理處的各廟壇公園典藏祭器，見發表於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敬天尊祖 禮樂備和：天壇館藏文物精選》（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8）。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典藏介紹參見郭家彥（Iain Clark），《皇朝禮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頁156-195。

5 郭家彥，《皇朝禮器》，頁156-195。

質祭器，提出國家祭祀所用之遵古瓷祭器以三禮為據，簠、簋、豆、登、鉶及爵燒成古彝器形制。⁶ 劉潞由禮儀的角度，分析《皇朝禮器圖式》祭器符合古代的古禮。⁷ 郭家彥 (Iain Clark) 綜合分析祭祀場域、儀式過程與祭器間的關係，並特別考察了瓷質祭器的顏色。⁸ 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更舉辦專門的研討會，探討《皇朝禮器圖式》祭器及多樣內容。⁹

這些祭器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簠、簋、豆、爵等器物雖與考古出土的周代銅器同名，器形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細覽這些所謂遵古改制的祭器，卻又存在與三代禮器格格不入的感覺。例如天壇正位所用匏爵未見於三代；太廟山尊雖具有商周時期大口尊的器形，但器蓋上卻是時代落差極大的寶珠鈕。這些差異顯示了乾隆朝祭器改革應有更多元的素材來源。

據乾隆朝《大清會典則例》，這一祭器改革的緣由為乾隆皇帝反思清初祭器沿用明代洪武以來以瓷碗盤代替古式祭器，僅存古代器名，以及學習雍正皇帝考據經典製作復古祭器頒賜曲阜孔廟的經驗。因此「思壇廟祭品，既遵用古名，則祭器亦應悉仿古制，一體更正，以備隆儀。」¹⁰ 將皇朝祭器的樣式更改回古代的樣貌，以名實相符。如陳芳妹已提出，山東曲阜孔子博物館展出了帶有雍正年款的簠、簋、豆、鉶、爵等五種祭器，與《皇朝禮器圖式》所載同類器相似性高，正說明乾隆皇帝的皇朝祭器改革，實為延伸雍正皇帝為曲阜孔廟製作的復古祭器。¹¹ (圖 1)

曲阜孔廟被視為祭祀孔子的本廟，在尊崇儒學的氛圍下，有不少歷代皇帝親祀及頒賜器物的記載。¹² 清前期皇帝也以連續頒賜曲阜孔廟器物表達對儒學的重視。據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刊行的《曲阜縣志》，康熙三十二年 (1693)、雍正七年 (1729)、十年 (1732)、乾隆六年 (1741)、十二年、三十年 (1765)、三十六年

6 王光堯，〈清代瓷質祭禮器略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2期，頁70-78。

7 劉潞，〈一部規範清代社會成員行為的圖譜——有關《皇朝禮器圖式》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4期，頁134-136。

8 郭家彥，《皇朝禮器》，頁94-153。

9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主辦，「皇朝禮器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年1月2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年8月22-23日。

10 (清)乾隆皇帝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75，頁25。相關討論參見張小李，〈略論清代大廟祭器、祭品陳設規制〉，頁67。

11 陳芳妹，〈雍正帝贈送曲阜孔廟的祭器——畫琺瑯五供與銅簠簋〉，《故宮學術季刊》，37卷1期 (2020.3)，頁97-101。

12 孔德平、彭慶濤、孟繼新，《祭孔禮樂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41-42。

(1771) 均曾頒賜禮樂器予曲阜孔廟。¹³ 陳芳妹在討論現藏於臺南市孔廟的蔣元樞進口臺灣府學禮樂器時，提出了康乾之際祭祀孔子的釋奠儀式禮樂變革。這一復古變革由康熙皇帝頒賜曲阜孔廟編鐘，改以中和韶樂祭孔，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銅祭器，到乾隆皇帝強化祭孔曲目中皇帝與孔子的關係，更頒賜十件周代器物。¹⁴ 這些連續的舉措，說明清前期皇帝極重視曲阜孔廟所用禮樂制度及器物是否合於古禮規範。這一對祀孔本廟禮樂的復古變革，在時序上早於對皇家祭器樣式的規範。

在這些釋奠禮樂器的改動中，尤其特殊的是乾隆皇帝頒賜成套周代青銅器給三間親祀孔廟，即國子監文廟、曲阜孔廟及熱河文廟。隨著國子監文廟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落成，乾隆皇帝擇內府所藏，頒賜十件周代銅器，做為進行釋奠儀式的陳設。¹⁵ 之後於三十六年，乾隆皇帝第七次於曲阜舉行釋奠儀式時，頒賜了另十件周代銅器。¹⁶ 四十四年（1779）熱河文廟落成，又頒賜十件周代銅器。¹⁷ 余慧君對此已有深入的討論，據文獻指出乾隆皇帝因曲阜孔廟陳設漢代祭器，頒賜周代器物，以彰顯孔子的從周之志。並將這一舉措放置於乾隆皇帝尊孔及其古銅器收藏的脈絡中討論，並論證這些內府收藏做為祭品（sacrificial offerings）的角色。¹⁸ 陳芳妹更指出此一以三代器物引入祭孔禮器的作法，是乾隆皇帝推崇儒學的獨特表達方式，是空前的。¹⁹

乾隆皇帝對古代銅器的強烈興趣，可反映於其敕纂的四本古銅器圖譜，即《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及《西清續鑑·乙編》。古代銅器被理解為「邃古法物」，可做為周代禮法的物質表現，與其即位初期追求儒學、古代禮儀經典的想法扣合。²⁰ 這一內府銅器的整理、出版，經過了乾隆九年（1745）起預

13 (清) 潘相，《曲阜縣志》，收入《新修方志叢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卷9，頁1。

14 陳芳妹，〈蔣元樞與臺灣府學的進口禮樂器〉，《故宮學術季刊》，30卷3期（2013春），頁135-148。

15 (清) 梁國志等奉敕修纂，《欽定國子監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46，頁1-2。

16 (清) 潘相，《曲阜縣志》，卷10，頁1-12；(清) 馮雲鵬、馮雲鶴，《金石索》（臺北：德志出版社，1963），卷首。

17 (清) 和坤等奉敕纂，《欽定熱河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74，頁8。

18 Hui-chun Y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112-139. 相關討論另見陳芳妹，〈發掘初期「安陽」文物的國際性移動——以羅振玉贈日本湯島聖堂的禮物為例〉，收入陳光祖主編，《金玉交輝——商周考古、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146-148。

19 陳芳妹，〈蔣元樞與臺灣府學的進口禮樂器〉，頁146-147。

20 〈上諭〉：「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奉上諭：邃古法物流傳有自者，惟尊彝鼎彝，歷世恆遠，良以質堅而體厚，不為燥濕所移，剝蝕所損，淵然之光，穆乎可見三代以上規模氣象，故嗜古之士亟有取焉。」(清) 梁詩正等奉敕纂，《欽定西清古鑑》，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修《西清古鑑》，至五十八年（1793）完成《西清續鑑》，漫長的時間可說明乾隆皇帝對古代銅器的重視與經營。特別是十二年開始進行祭器改革時，正在預修《西清古鑑》，三十三年頒賜國子監文廟周代銅器時，正值編修《寧壽鑑古》。²¹ 充斥宮廷的三代彝器是否曾對皇朝祭器的形成產生影響？乾隆皇帝對古代銅器的鑑賞，如何通過頒賜周代銅器改變孔廟的祭器配置？

過去的研究已說明曲阜孔廟為康熙乾三帝所關注的禮儀場域。2019年山東曲阜孔子博物館開幕，及同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展出了許多曲阜孔廟及孔府的重要典藏，由此能更進一步分析皇朝祭器與孔廟的關係。本文將在以上脈絡，說明孔廟祭器傳統如何成為《皇朝禮器圖式》祭器遵循的古代範式；另一方面，乾隆皇帝的銅器收藏及鑑賞觀，如何通過頒賜古代青銅器，改變釋奠祭器陳設的面貌。

二、從曲阜孔廟出發：雍正朝釋奠祭器到乾隆朝皇朝祭器樣式的形成

（一）雍正釋奠祭器

清初皇朝祭器延續明代以瓷盤、瓷碗為之，曲阜孔廟祭器則為明代形制的銅器。在山東通政使留保請求雍正皇帝頒賜新的當朝祭器，以取代原有明代祭器，如何設計出復古又有當朝特色的釋奠祭器成為重要的議題。²² 檢視孔子博物館展出的簠、簋、豆、銅、爵等五種帶有雍正八年（1730）「大清雍正庚戌年造」款銅祭器的器形，可看出雍正皇帝頒賜的祭器並非按三代銅禮器製作，而是依循南宋以來地方廟學所奉行的《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以下簡稱《釋奠儀圖》）禮器傳統，即南宋朱熹依三代禮器形制設計的廟學禮器。²³ 分析如下：

〈上諭〉，頁1。

- 21 張榮、劉淨賢，〈「西清四鑑」的成書、版本及流傳〉，收入《西清古鑑今訪·北京故宮博物院卷》（紐約：胡盈瑩與范季融基金會，2020），頁474-487。（待刊）
- 22 （清）杜詔、岳濬，《山東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11之4，頁61。相關討論見陳芳妹，〈雍正帝贈送曲阜孔廟的祭器——畫珪瑯五供與銅簠簋〉，《故宮學術季刊》，37卷1期（2020.3），頁97-101。
- 23 （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如陳芳妹及許雅惠已論述的，朱熹提出一套以三代器物為本的祭孔禮器，並強調銅的使用。這一套釋奠儀式詳載於《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正文簡稱《釋奠儀圖》），並有對應的禮器圖。這一圖式流傳廣泛，在朱熹身後推廣到中國各地，甚至韓國、越南等地也加以採用。參見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

- (1) 簠：分為方斗形的器身與器蓋兩個部分。三代方斗形銅簠及宋代《考古圖》所載同類銅簠為器蓋、器身對襯形式，雍正皇帝頒賜的銅簠蓋面為獸面紋，上有波曲裝飾，器身施重環紋及獸面紋，下有一方座接雲紋外撇四足，器蓋與器身紋飾及形狀皆不盡相同。²⁴（圖 2）器、蓋不同，蓋上設波曲裝飾的設計，見諸於宋代《釋奠儀圖》、²⁵ 宋版《纂圖互註周禮》，²⁶ 及明代《闕里志》〈禮器圖〉、²⁷ 《成化新昌縣志》〈禮器圖〉。²⁸（圖 3）如李定恩已提出，《纂圖互註周禮》簠的圖樣來自《釋奠儀圖》。²⁹ 明初也借用《釋奠儀圖》簠的樣式為皇家禮器，如洪武年間編修的《明集禮》，祭器簠即為此一樣式。³⁰（圖 4）
- (2) 簋：簋的形式承襲自《釋奠儀圖》。《釋奠儀圖》簋的形式不見於上古時期，而像是由西周晚期橢方形盨與橢圓形簋組合而成的新設計。（圖 5）依此製作的簋，如上海博物館藏明代監察御史為崑山廟學所做銅簋。雍正款簋與《釋奠儀圖》簋的主要區別在圈足加高且無缺口。
- (3) 豆：豆的形式也承襲自《釋奠儀圖》，並可追溯至宋代復古改制的銅豆。《釋奠儀圖》豆身上的大圓乳丁、迴轉紋飾及器柄的鏤空波曲紋，均與傳世宋代銅豆，如宣和豆及紹興豆等相近。³¹ 《釋奠儀圖》豆配有絞索紐器蓋，依此式製

美術史研究集刊》，14 期（2003.3），頁 10-15；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 期（2012.3），頁 103-170；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釋奠儀式」的形成及影響〉，《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191-255；李定恩，〈《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制定背景與朝鮮初期禮制藝術之形成〉，《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4 期（2018.3），頁 99-174。

24（宋）呂大臨，《考古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3，頁 43。

25（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頁 33。

26（漢）鄭玄註，（唐）陸德明釋，《纂圖互註周禮》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經部，卷 1，頁 15-16。

27（明）陳鏞，《闕里志》，收入吳平等主編，《中國祠墓志叢刊 21》（揚州：廣陵書社，2004），卷 2，頁 3。

28（明）李輝修，莫旦纂，《成化新昌縣志》，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 106》（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卷 1，頁 6。

29 李定恩，〈《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制定背景與朝鮮初期禮制藝術之形成〉，頁 107。

30（明）徐一夔，《明集禮》，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2，頁 37。

31 關於宋代復古改制銅豆的討論，見 Michel Maucuer, *Bronze de la Chine Impériale des Song aux Qing* (Paris: Paris-Musées, les musées de la Ville de Paris, 2013), 42-43；蘇榮譽、周亞、艾素珊 (Susan Erickson)，〈宋代銅豆初探〉，收入陳建明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49-265；陳芳妹，〈宋代「金學」的興起與宋代仿古銅器〉，《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45-50。

作者，如元代文靖書院豆。³² 雍正皇帝頒賜的銅豆也是依《釋奠儀圖》豆的形式設計，但紋飾不再強調大圓乳丁及迴轉紋，而改採周代銅器常見的垂麟紋及波曲紋，柄部改為三段式浮雕。值得注意的是，曲阜孔廟藏有成套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銅豆。據其上銘文，為監察御史下令，嘉興知府金裕、徐霖督工鑄造，器蓋上有「孔廟祭器」款。（圖 6）器形並未按照《釋奠儀圖》豆製作，而是將豆身與寶珠鈕蓋做成方折狀，飾回紋，豆柄無鏤空，圈足飾菱格萬字紋。說明了明代曲阜孔廟使用的祭器與前述監察御史為崑山廟學所造祭器不同，並不強調使用《釋奠儀圖》的祭器樣式。

- (4) 爵：爵帶有雙圓弧流，兩流長短略有差異，與三代銅爵一短尖尾、一長流口不同。自宋代依三代銅器製作禮器，爵的形態多維持三代樣式，如元代大德乙巳年（1305）湖南瀏陽文靖書院爵（圖 7a）、皇慶壬子年（1312）皇慶王子爵。³³ 但稍晚鑄於延祐年間的全寧路文廟爵及至正十年（1350）淮安路學爵已將短尖尾改為短寬圓弧形式。³⁴ 四庫全書本《釋奠儀圖》的爵與後者相仿，為一長一短的寬圓弧流。³⁵ 雍正款爵口沿上短柱的蘑菇柱帽也與《釋奠儀圖》爵的多層柱帽不同，或許說明其更多地採用了明代爵的樣式。（圖 7b）
- (5) 銅：銅不在《釋奠儀圖》的範圍，但見於明代《闕里志》〈禮器圖〉³⁶ 及康熙年間《文廟禮樂考》。³⁷（圖 3）在《三禮圖集注》中，銅鼎為配有器蓋的橢圓鼎，下有三小足。³⁸《明集禮》銅則為帶蓋三足雙耳鼎，足細瘦外撇。³⁹《文廟禮樂考》銅與《明集禮》銅較為相近。⁴⁰（圖 8）橢圓形的雍正款銅，器蓋主要紋飾為宋元以來流行的菱格萬字紋，相近紋飾見於江西宜春元代窖藏銅爐，⁴¹ 也見於前述明成化年銅豆；器身以蜂巢狀的回紋為主。器蓋及器足相互呼應，設計為三個葉形。器身兩側有龍形環耳。形式上似為《三禮圖集注》銅與《闕

32 陳建明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頁 173-174。

33 陳建明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頁 182-183。

34 陸鵬亮推估全寧路祭器鑄於 1317 至 1327 年之間。陸鵬亮，〈公主的銅器——元代全寧路祭器小考〉，《故宮文物月刊》，404 期（2016.11），頁 18-26。

35（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頁 44。

36（明）陳鏞，《闕里志》，卷 2，頁 5。

37（清）金之植、宋鈺，《文廟禮樂考》（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禮部〉，頁 41。

38（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13，頁 16。

39（明）徐一夔，《明集禮》，卷 7，頁 6。

40（清）金之植、宋鈺，《文廟禮樂考》，〈禮部〉，頁 41。

41 謝志杰、王虹光，〈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簡報〉，《南方文物》，1990 年 2 期，頁 2，封 2.5。

里志》鉶的結合，再加上當代詮釋。

總體看來，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的祭器，器形多本於《釋奠儀圖》禮器，也融入明代器物的特徵，並加入一些當代設計。器類選擇上，據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行的《曲阜縣志》，雍正十年（1732）頒賜的復古祭器除前述五種，另有登及竹木祭器籩及盛帛的筐。⁴²這一組合以在釋奠祭器佔有核心地位的粢盛器為主，並選用少見於釋奠禮器圖的粢盛器鉶，但酒器僅選擇爵，未採用《釋奠儀圖》中形式多樣的尊、壘等酒器，表現了對粢盛器的重視。

（二）由釋奠祭器至皇朝祭器

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的器物形制，在乾隆朝沿用並擴大，用於所有的皇家壇廟。將《皇朝禮器圖式》所載同類器與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祭器對比，僅爵的形制略有出入，由尖椎足改為柱足，形式更接近王光堯所指出的元明時期爵的樣式。⁴³（圖3）據《曲阜縣志》，曲阜孔廟所藏乾隆十二年以前頒賜的祭器與《皇朝禮器圖式》所載同類祭器，僅在尺寸上略有不同，也說明了乾隆朝祭器改革在器物尺寸上進行了微調。⁴⁴如陳芳妹已論述的，乾隆皇帝沿用雍正時期制訂的祭器形制，有賴於在兩朝接續負責成造頒賜曲阜孔廟祭器的允祿。他更受命編修《皇朝禮器圖式》，足見其在規劃皇朝祭器上的關鍵地位。⁴⁵

乾隆皇帝在統治初期延續雍正朝頒賜曲阜孔廟復古祭器，促使其持續關注雍正朝的復古釋奠祭器。據《曲阜縣志》載，在雍正皇帝於十年頒賜復古祭器及乾隆十二年正式詔令遵古改造祭器之間，乾隆六年頒鉶、筐、簋、籩、豆，十二年賜爵。⁴⁶乾隆皇帝兩次頒賜復古祭器，說明詔令進行祭器改革前，這些祭器類型一直在重複製作。對釋奠儀式的關心，更見於《乾隆朝內務府各作活計檔》（以下簡稱《活計檔》）。如乾隆元年二月七日曾命畫院處模仿原有釋奠圖繪製一卷，也說明了乾隆皇帝自即位之初即留意釋奠祭器相關的內容。⁴⁷這些祭器類型及圖像在乾隆朝初期持續製作，終成為皇朝祭器樣式的主要來源。

42（清）潘相，《曲阜縣志》，卷9，頁1-2。

43 王光堯，〈清代瓷質祭禮器略論〉，頁75。

44（清）潘相，《曲阜縣志》，卷11，頁1。

45 陳芳妹，〈雍正帝贈送曲阜孔廟的祭器——畫瑤五供與銅簋籩〉，頁97-101。

46（清）潘相，《曲阜縣志》，卷9，頁1。

47《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7，乾隆元年二月七日〈畫院處〉，頁180-181。

雖有多位學者提出《皇朝禮器圖式》中帶有雙獸耳的著尊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代弘治黃釉尊相近，為其模仿對象，⁴⁸但這種著尊形式在宋代便已是釋奠祭器的基本組成，也見諸歷代釋奠禮器圖。⁴⁹因此，如弘治黃釉尊與《成化新昌縣志》〈禮器圖〉所繪著尊的相似性所示，著尊也可能如前述銅簠的情況，是明代各種祭祀場合通用的祭器類型。

(三) 漢章帝頒賜曲阜孔廟的陳設

曲阜孔廟舊有的祭器陳設，也是乾隆皇帝制訂皇朝祭器的重要參考。乾隆十三年《活計檔》載：「五月初四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刑部尚書汪由敦交《博古圖》書一本，傳旨照書上象罇、犧罇畫樣呈覽，再照山東孔廟內的山罇樣亦畫樣呈覽，欽此。於本日司庫白世秀將畫得象罇、犧罇、山罇紙樣三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撥蠟樣呈覽，准時鑄造銅的，欽此。」明確紀錄《皇朝禮器圖式》太廟所用山尊仿自曲阜孔廟山尊，犧尊、象尊則是結合曲阜孔廟所藏及《宣和博古圖》圖繪設計，以銅鑄造。⁵⁰（圖9）

通過《皇朝禮器圖式》圖繪、北京故宮與曲阜孔廟所藏器物對比，《活計檔》所載曲阜孔廟三件銅器即為傳說中西漢章帝於元和二年（85）所賜之物。這組器物一共五件，除銅山尊、銅犧尊、銅象尊，還包括銅雷尊及陶太尊。（圖10）因山尊上鑄有元和二年銘文，故一直被認為是西漢時期的器物。但由器物形制看，這五件器物除陶太尊為漢代常見的白陶倉外，均非漢代器物。四件銅器各配有器蓋，雷尊、象尊及犧尊器蓋配有寶珠鈕頂，邊沿為波浪荷葉形。象尊及犧尊為負尊形象，身上飾有如意雲頭。許雅惠已提出元代儒官曾議論認為釋奠儀式使用的犧尊、象尊應於背上負尊。⁵¹四件銅尊的裝飾組合則多見於元代及明初的瓷器。⁵²因此，這幾件銅器應是元代或明代製作，而非漢代的作品。

山尊、犧尊、象尊均載於《釋奠儀圖》，但乾隆皇帝未採取書中樣式，而是以

48 王光堯，〈清代瓷質祭禮器略論〉，頁73；郭家彥，〈皇朝禮器〉，頁126-127。

49 這種著尊形式，見載於（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頁39；（明）陳鏞，《闕里志》，卷2，頁3；（明）李楫修，莫旦纂，《成化新昌縣志》，卷1，頁6。

5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6，乾隆十三年五月四日〈鑄爐處〉，頁291。

51 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頁6。

52 寶珠鈕荷葉蓋及如意雲頭紋等形式的元代瓷器對比品，見上海博物館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上海博物館，2012），頁67、81、82、187-191。也見於明初瓷器，如明洪武釉裡紅四季花卉紋蓋罐，參見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12·明（上）》（臺北：錦繡出版社，2001），圖版233。

當時視為漢代的器物為本。⁵³《欽定國子監志》記述其頒賜國子監文廟周代器物的原由，稱：「闕里廟堂有後漢時犧象諸尊以為觀美」，可見乾隆皇帝極推崇曲阜孔廟漢代五尊的陳設效果。⁵⁴

(四) 孔廟脈絡以外的祭器

《皇朝禮器圖式》所載乾隆朝改革的祭器，另有一些孔廟脈絡以外的類別，包括沿襲明代的皇朝祭禮器，以及當朝的創新祭器。

如前所述，乾隆朝祭器改革源於對明代祭禮器的反思。除了如王光堯已提出，《皇朝禮器圖式》瓷質祭器中的圓弧短流爵、著尊及杯形琖等三類與明代祭器有關，璧、琮、珪等三種玉祭器，也延續了明代皇朝祭器形式。⁵⁵玉璧在自然神祭祀傳統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乾隆皇帝對古代玉器的喜愛，反映在其所做的多首詠玉詩中。其中年代最早的一首詠玉璧詩，即作於祭器改革的乾隆十二年。⁵⁶詩文表達了乾隆皇帝對玉璧質地、色澤及年代的興趣及認識，說明他相當瞭解古代玉璧的形制。《皇朝禮器圖式》所載玉璧用於祭祀自然神，依據祭祀對象的屬性而有顏色、紋飾的區別。天壇正位用蒼璧，朝日壇用赤璧，夕月壇正位用白璧。⁵⁷這些玉璧大小有別，形制均為中孔比例極小的厚圓板狀。這些玉璧的形制不僅與乾隆皇帝收藏的古代玉璧有別，也與宋代禮器圖譜《三禮圖》⁵⁸及古器物圖譜《考古圖》描繪的玉璧不同，⁵⁹而與明代定陵出土的玉璧非常相近。(圖 11、12) 與定陵玉璧同組的方形片狀玉琮，⁶⁰雖與《皇朝禮器圖式》方形弧背的玉琮不盡相同，⁶¹但與年代較晚的簡化黃琮接近。⁶²方形片狀的形制或許也是由明代玉禮器而來。

53 山尊、犧尊、象尊見(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頁 35、36、38。

54 (清)梁國治等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卷 1，頁 24。

55 王光堯，〈清代瓷質祭禮器略論〉，頁 73。

56 (清)高宗，《御製詩初集》，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卷 40，〈漢玉璧〉，頁 11-12。這件玉璧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器上刻有這首御製詩：「本來猶是昆岡石，一片紅雲變英白。入土出土千年易，形如滿月徑逾尺。天然豈有剛刻迹，為穀為蒲不可識。鼂采內藏土華蝕，庇蔭嘉穀此其德。特達廉貞壽而澤，宜登宣室之筭席。」後有「乾隆丁卯孟夏御題」及「幾瑕怡情」、「得佳趣」兩方陰刻篆書方章款。徐琳，〈故宮博物院藏齊家文化玉璧綜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 年 3 期，頁 138-139。

57 (清)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頁 2、45、56。

58 (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 10，頁 11-12。

59 (宋)呂大臨，《考古圖》，卷 8，頁 7。

60 定陵玉璧、玉琮的認定，見鄧淑蘋，《乾隆皇帝的智與昧》(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頁 68-69。

61 (清)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頁 27。

62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敬天尊祖 禮樂備和：天壇館藏文物精選》，頁 141。

(圖 12、13)

乾隆朝在祭器上的創新，以匏爵最具代表性。據《皇朝禮器圖式》的說明，清代舊制天壇用玉爵，但乾隆皇帝以《禮記·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的概念出發，設計為「剝椰實之半不雕刻，取尚質之義。高一寸八分，深一寸三分，口徑三寸七分。金裏承以旃檀香為之。其下岐出為三足，象爵形，高二寸九分。」⁶³與現藏於天壇的乾隆朝匏爵實物相符。(圖 14)在三禮相關的禮器圖中，有不少匏爵器形的圖繪。《御定三禮義疏》第二部《欽定儀禮義疏》卷 42〈禮器圖二〉云：「案士昏禮合卺謂破匏為之，卽匏爵也。」按《三禮圖》將匏爵繪成匏瓜剖半的勺形，解說也多採《三禮圖》之說。⁶⁴但接續制訂皇朝祭器時，以椰殼剖半為杯形，內襯銀質鑲金內杯，再以檀木做成爵的三足形象為托座，構成了全新的造型，並改變了過去認定的金屬、陶瓷、竹木等，以單一材質製作祭器的作法。《活計檔》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如意館〉記錄了新制祭器樣式擬定後，各種材質祭器的製作地點：「祭器內銅器交莊親王成做，瓷器交江西唐英燒造，編竹絲漆器交蘇州織造圖拉成做，匏爵交粵海關策楞成造，木胎掃金嵌玉祭器交造辦處成造。」⁶⁵相較於經常成作皇家瓷器的江西，漆木器的蘇州，由粵海關以南方邊境特有的材料製作天壇匏爵杯，不論在材質及地域空間的想像上，均是相當顛覆傳統的作法。

三、列姬朝法物「用備禮器」：皇帝親祀孔廟的周代銅器

(一) 皇帝親祀孔廟的周代銅器配置

在《皇朝禮器圖式》以周禮為概念建構的祭器制度中，宋代以來的地方廟學釋奠祭器傳統及曲阜祀孔本廟成為汲取周禮及古代祭器形制的重要參考。相映地，孔廟祭祀陳設的合宜性，也成為乾隆皇帝關心的問題。許多文獻、檔案記錄了他為親祀的三處孔廟配置周代銅器的過程，可以進一步瞭解配置三套銅器的想法及原來製作的狀態。

63 (清) 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頁 2-3。《活計檔》更有爵托以白檀木製作的紀錄。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2，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廣木作〉，頁 147。

64 (清) 允祿等奉敕纂，《欽定儀禮義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 42，頁 45。《三禮圖》匏爵見(宋) 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 12，頁 3。

6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7，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如意館〉，頁 240-241。

1. 國子監文廟「周範十器」

據《欽定國子監志》記載，乾隆三十三年國子監文廟落成時，因乾隆皇帝欣賞曲阜孔廟漢代五尊的陳設效果，「爰擇內府所藏周銅鼎、尊、卣、壘、壺、簋、簋、觚、爵、洗各一，頒置太學陳之大成殿中用備禮器。夫孔子志在從周，楹間列姬朝法物，於義惟允，所司其敬凜，將事典守勿替以克副朕意」，⁶⁶ 挑選十件內府典藏的周代銅器頒賜國子監文廟，陳設於大成殿，以彰顯孔子的從周之志。排序方式大致按《西清古鑑》，以鼎、尊為首。十件銅器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包括周康侯鼎、周犧尊、周內言卣、周犧首壘、周雷紋壺、周召仲簋、周盟簋、周雷紋觚、周子爵、周素洗，以「周範十器」統稱。⁶⁷（圖 15）頒賜國子監時的樣態，記錄於《欽定國子監志》，每件器物均配有木座，周康侯鼎更配有玉頂木蓋。⁶⁸（圖 16）

《活計檔》記錄了國子監「周範十器」的配置過程，從中可看出乾隆皇帝如何慎重規劃此組呈現周代的器物。乾隆三十三年底開始挑選銅器，由器物名稱看，最初挑選十二件，除前述十件，另有後來刪去的周辛未彝及釋奠禮器圖中常見的龍勺。⁶⁹ 確定銅器的組合後，即命配置裝盛用的個別木匣及外套箱。完成後，乾隆皇帝提出一張楠木桌，要求「案腿另換做三尺二寸高，腿子拖泥要四寸厚，再按銅器十件前後次序，座子底足在案面上分均，白子俱下槽擺。」⁷⁰ 說明銅器平均分布在桌案上，並按照每件器物木座座腳的形式，於桌面刻出對應的凹槽。如此，於大成殿陳設時，每件銅器即可按照預設的位置擺放在桌上，以確保每次祭祀時每件器物都以正確的位置及方向陳列。十件器物分前後兩排放置，以方形器置中，次序如下：⁷¹

66（清）梁國治等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卷 1，頁 24。

67「周範十器」名稱見（清）梁國治等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卷 46，頁 1。

68（清）梁國治等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卷 46，頁 3-16；（清）梁詩正等奉敕纂，《欽定西清古鑑》，總目。

69《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1，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匣作〉，頁 678-679。龍勺見載於（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頁 4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之元碑拓本廣西桂林學府〈釋奠犧牲幣器服圖〉、（明）陳鎬輯，《闕里志》，〈禮器圖〉（卷 2，頁 3）、及（明）李楫修、莫旦纂，《成化新昌縣志》〈禮器圖〉（卷 1，頁 6）等。

70《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1，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匣作〉，頁 678。

71《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2，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如意館〉，頁 689。

(前) 周素洗 周犧罇 周康侯鼎 周內言卣 周子爵
 前左二 前左一 前中 前右一 前右二
 (後) 周雷紋觚 周雷紋壺 周召中簠 周犧首罍 周明簠
 後左二 後左一 後中 後右一 後右二

嘉慶朝《大清會典圖》〈大成殿正位陳設〉將此組有序排列於木案上的器物群稱為「周範案」，設於乾隆朝遵古改制祭器和爐、瓶、燭五供之間，用於陳設，不裝盛供品。⁷² (圖 17)《曲阜縣志》提及曲阜孔廟大成殿原有的漢代五尊「共為一案，陳而不用」，說明乾隆皇帝以桌案陳列周代銅器的作法，也是按照曲阜孔廟漢代五尊的陳設方式設置。⁷³

2. 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

乾隆三十六年，乾隆皇帝以相同的規模集成另一套十件他所認可的周代銅器，頒賜曲阜孔廟。他對頒賜曲阜孔廟十件周代銅器的想法，可見於為此事所作的御製詩並序。⁷⁴〈頒內府周範銅器十事交衍聖公孔昭煥陳闕里廟庭詩以誌事〉序：

釋奠而飭豆籩，新型既備，登堂而觀車服，古澤奚存。繫案臚犧象諸尊，第歎識元和所鑄，雖協吉金用享，還疑贗鼎無稽。矧辨名溯三代以前，何知有漢。而學禮景當年之志，亦曰從周。昨脩太學落成，曾列姬朝雅範，惟此昌平故里，靈實憑焉。每徵法物舊章，心恒惻若，宜陳禮器，以煥宮牆。擬俟鑿迴，內府檢西京彝鼎，將從郵置成數，充東國几筵。意在尊師體尊王之有素守，當永世勗永寶之無愆。既沛十行，兼成八韻。

詩：

二千年閱古，禮器惜徒言，車服那輕補車服非歷久之物未宜補陳，鼎彝頗尚存，肆筵瞻闕若，由驛致更番，後漢徹時降大成殿內几列犧象山雷四尊為後漢元和二年鑄，又瓦器一亦非古物，並令別藏廟庫，尊周緬意敦，穆如陳几案，潔用薦蘋蘩，國學依成

72 (清) 拖律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圖》，收入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冊 21，頁 428-429。

73 (清) 潘相，《曲阜縣志》，卷 10，頁 1。

74 (清) 高宗，《御製詩三集》，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卷 98，〈頒內府周範銅器十事交衍聖公孔昭煥陳闕里廟庭詩以誌事〉，頁 28-29。

例，昌平奉聖源，微仲敬師志，益勗作君原，庶協崇文願，興賢共坐論。

文中一反頒賜國子監「周範十器」時，看待曲阜孔廟漢代五尊的正面態度，反思那些在祭器改革中做為重要參考的漢代五尊的合宜性。認為漢代的器物無法匹配孔子從周之志外，更將漢代陶太倉斥之為偽物，令收入庫房，廢而不用。並以國子監文廟的經驗，頒賜曲阜孔廟十件色澤、形制皆堪配孔子理想的周代銅器。在選件上，著重於「西京彝鼎」，應是指陝西一帶西周宗周遺址出土的青銅器。

十件周代銅器見載於乾隆三十九年潘相《曲阜縣志》、道光元年（1821）馮雲鵬、馮雲鶴《金石索》及光緒十三年（1887）刊刻的孔尚忻《聖門禮誌》等書。⁷⁵馮雲鵬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目驗這套珍貴的銅器時，以「神彩驚人，不敢逼視」形容，並提到平時收儲庫房，「惟春、秋兩大祭請出陳設，其冬夏私祭亦不敢陳，所以重國典，謹守藏也。」⁷⁶一般祭祀不輕易取出，僅於春秋兩季的重大祭祀中陳設，說明曲阜孔廟極珍視此套器物。馮雲鵬的觀感也說明了這套器物在民間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此套「周範銅器十事」現仍典藏於原處。銅器曾多次展出，並以出版形式發表。⁷⁷（圖 18）每件器物均配木座，木座上刻有器物名稱及天干號，並有「乾隆御賞」款。周木鼎、周四足鬲、周饗饗甗及周伯彝等四器配有玉頂木蓋。此外，如前述國子監文廟「周範十器」，每件器物均配有匣盒，並有花梨木案一張，現均完好保存於孔子博物館。⁷⁸木案上刻有十件器物的器名及天干號，外環以每件器物木座的腳槽。（圖 19）按木案上的文字所示，十件銅器的組成及於桌上的排列順序為：

75（清）潘相，《曲阜縣志》，卷 10，頁 1-12；（清）孔尚忻，《聖門禮誌》（據光緒十三年曲阜孔氏硯寬亭重刻本影印），收入丁鳳麟等主編，《中國華東文獻叢書 第 3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卷 116，頁 62-63；（清）馮雲鵬、馮雲鶴，《金石索》，卷首，頁 3-22。

76（清）馮雲鵬、馮雲鶴，《金石索》，卷首，頁 22-23。

77 曲阜孔廟之「周範銅器十事」在 1909 年即見發表於 É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Ernest Leroux, 1909, pl. ccxcv; 另見張作耀，《大哉孔子》（香港：和平圖書公司，1991），頁 95-96；國寶法蘭西之旅編委會編，《國寶法蘭西之旅：赴法『中國文化年』文物展覽精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78-87。

78 孔子博物館於 2019 年 5 月協助提件目驗「周範銅器十事」木案，在此致以感謝。

周木鼎	周冊卣	周四足鬲	周蟠夔敦	周饗饗獻
癸	壬	辛	庚	己
周夔鳳豆	周寶簠	周伯彝	周犧尊	周亞尊
甲	乙	丙	丁	戊

器物木座上的天干號代表每件器物在木案上的排列順序。排列方式與國子監文廟「周範十器」相較，除方形四足器置於中間，其他的排序不盡相同。

《活計檔》詳細記錄了這套器物的配置過程。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廣木作〉記：「青綠周寶簠一件隨木座甲改為乙、青綠周夔鳳豆一件隨木座乙改為甲、青綠周蟠夔敦一件隨木座丙改為庚、青綠周犧尊一件隨木座玉鑲嵌一塊丁、青綠周木鼎一件隨木座蓋玉項戊改為癸、青綠饗饗獻一件隨木座蓋玉項己、青綠周亞尊一件隨木座庚改為戊、青綠周四足鬲一件隨木座蓋玉項辛、青綠周冊卣一件隨木座壬、青綠周伯彝一件隨木座蓋玉項癸改為丙」⁷⁹，列出了與現存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相同的器物及天干號，並說明這一系列順序經過一次改動。改動前的排序方式如下：

周伯彝	周冊卣	周四足鬲	周亞尊	周饗饗獻
癸	壬	辛	庚	己
周寶簠	周夔鳳豆	周蟠夔敦	周犧尊	周木鼎
甲	乙	丙	丁	戊

比較改動前後的差異，兩排銅器中的一排以木蓋的有無穿插排列，另一排將帶有木蓋的周伯彝改置於中央，使視覺感更加協調。另一方面，將四件較高的器物調整至兩側。這些改動顯示最終的配置是以木蓋的有無、器物高矮為佈局平衡與否的原則。

配置完成後，再進行木匣及木案的製作。由廣木作「照樣准下槽安面上併外套匣上，將青綠周器十件名色併甲乙丙丁十個字，俱按次序刻上。所刻之字摹樣交懋勤殿翰林寫欽此。」將每件銅器的器名及次序天干號刻寫在匣盒上。接著「於六月二十四日庫掌四德將青綠器十件配得打色木匣一件，將匣蓋上刻得名色並花梨木案一張，桌面亦刻得名色，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在外匣蓋與案面，也刻寫器

7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4，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廣木作〉，頁 634。

名及天干次序。「面奉旨青綠器十件交懋勤殿翰林們辦寫圖說冊頁，得時交如意館做冊頁」，於配置完成後，再由懋勤殿、造辦處如意館共同製作描繪器物樣貌及說明文字的冊頁圖譜。⁸⁰最後於七月十八日由如意館周本繪製。⁸¹所有配做的配件也有詳細的記錄「庫掌四德將孔廟花梨木案一張上擺青綠器□件，配得合牌冊頁樣一冊，雕巴達馬罩蓋匣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冊頁樣交懋勤殿，其匣子照樣准做素罩蓋匣一件。」⁸²由是，頒賜曲阜孔廟的「周範銅器十事」，全套共包括十件內府收藏的青銅器，以及內務府造辦處配做的木蓋、木座、打色木匣，雕巴達馬罩蓋匣、冊頁圖譜及花梨木案一張。

3. 熱河文廟銅器

乾隆四十四年，熱河文廟落成時頒賜的十件銅器，現藏地未見報導，但在《欽定熱河志》中有詳細的圖像紀錄。（圖 20）與《欽定國子監志》的表現方法不同，僅繪出十件銅器，而無木蓋、木座等配件；錄有銘文及釋文，格式十分接近當時已完成的《西清古鑑》、《寧壽鑑古》。⁸³

選配過程如國子監文廟「周範十器」般，經過了篩選替換。第一批挑選出來的銅器包括周雷紋爵、周蟬紋簋、周寶尊、周蟠夔匝、周戊斝、周蟠夔鼎、周蟠夔壺、周列伯敦、周雷紋觚、周叔朕簠等十件。再由乾隆皇帝按照國子監文廟的配置，挑選出文王鼎、蟠夔壺、夔鳳卣、素洗，連帶原配木座，替換周蟠夔匝、周戊斝、周蟠夔鼎、周列伯敦，使器類的選擇上與國子監「周範十器」更加接近。後又將原配之周雷紋觚以另一件較高的雷紋觚替換。⁸⁴並選定用來擺放的紫檀木案，由謝遂依照銅器款式繪製冊頁圖譜。擺法按照國子監文廟「周範十器」的次序如下：⁸⁵

（前）	素洗	寶尊	文王鼎	夔鳳卣	雷紋爵
	前左二	前左一	前中	前右一	前右二
（後）	雷紋觚	蟠夔壺	叔朕簠	蟠夔鼎	蟬紋簋
	後左二	後左一	後中	後右一	後右二

8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4，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廣木作〉，頁 634-635。

8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4，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如意館〉，頁 497。

8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4，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廣木作〉，頁 634-635。

83 （清）和珅等奉敕纂，《欽定熱河志》，卷 74，頁 8-18。

8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3，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九日〈廣木作〉，頁 22-23。

8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2，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如意館〉，頁 689-690。

這組器物以方鼎置於中心位置。與國子監文廟、曲阜孔廟銅器群對比，方型四足器被視為最重要的器形。器類上，國子監及曲阜孔廟銅器群均有的犧尊，未選入熱河文廟銅器。

(二) 三套周代銅器的年代與乾隆皇帝對古銅器的鑑別利用

從今日的角度看，三套文廟銅器並非都是周代的器物。張臨生已分析國子監文廟「周範十器」的年代，認為周子爵為商代，周康侯鼎、周犧首壘、周犧尊等三件為周代，周素洗為漢代，周內言卣、周雷紋壺、周召仲簋、周盟簋、周雷紋觚等則為宋代以後的偽器。⁸⁶ 曲阜孔廟及熱河文廟的兩套器物也同樣是以商代、西周、漢代及宋代、明代的器物組合而成。⁸⁷

余慧君由曲阜孔廟銅器所配木座上均有「乾隆御玩」款，提出這些器物與乾隆皇帝寧壽宮收藏有關。⁸⁸ 寧壽宮雖建於康熙年間，但在乾隆三十六至四十一年（1776）間進行大規模整建，以做為乾隆皇帝退位後居住的地方。《活計檔》中寧壽宮古玩的整理配置與建築整建的期間相當，在三十八年古玩檔中有調整周代古銅器的紀錄，命「寧壽宮所安古玩格銅器格內古玩，已入書者將木座刻乾隆御玩」。⁸⁹ 說明三十六年配置的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可能是由原來預備給寧壽宮陳設的古玩中挑選出來的。最後陳列於寧壽宮的古代銅器精粹，按《西清古鑑》形式，錄於《寧壽鑑古》。⁹⁰ 熱河文廟銅器群則是由御花園的陳設中挑選出來。⁹¹

如前所述，三套孔廟銅器均配有冊頁圖譜，現僅能通過《曲阜縣志》及《金索》，得見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冊頁圖譜中器物圖樣、銘文及說明文字等內容。⁹² 《曲阜縣志》更摹有冊頁上「乾隆御覽之寶」、「含英咀華」、「茹古含今」等等代表曾經過乾隆皇帝御覽、鑑賞的印文，更進一步加強皇帝本身與這套器物間的

86 張臨生，〈真膺相軫的國子監周範十器〉，《故宮文物月刊》，73期（1989.4），頁34-55。

87 羅覃（Thomas Lawton）曾提出曲阜孔廟銅器年代混雜的現象，見 Thomas Lawton, "An Imperial Legacy Revisited: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Qing Palace Museum," *Asian Art* 1:1 (1987/1988): 56.

88 Y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131.

8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6，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古玩檔〉，頁273。

90（清）沈初，《西清筆記》，卷1：「內府所藏銅器，備載《西清古鑑》一書。寧壽宮落成，上命以成書後所得之件，選貯於內，命纂《寧壽古鑑》，體例視《西清古鑑》，而所貯不及十之二三。」《寧壽鑑古》未曾出版，僅有初編時的寫本。（清）沈初，《西清筆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八九）》（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1，頁6。

9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3，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九日〈廣木作〉，頁23。

92（清）潘相，《曲阜縣志》，卷10，頁1-12；（清）馮雲鵬、馮雲鶴，《金石索》，卷首，頁1-22。

連結。⁹³但《曲阜縣志》內容有圖文錯置的情形，如周木鼎與周蟠夔敦圖像錯置，四足鬲紋飾與原器不符。(圖 21)《金索》所載較為確實。這些紀錄標示的銅器天干次序與器物木座及桌案上的排列次序不同，依次為：周木鼎_甲、周亞尊_乙、周犧尊_丙、周伯彝_丁、周冊_戊、周蟠夔敦_己、周寶簠_庚、周夔鳳豆_辛、周饗鬶_壬、周四足鬲_癸。⁹⁴與前述十器在桌案上的排列次序對比，這一天干序列不是木案上的排列次序。《活計檔》記錄的熱河文廟銅器天干次序也與之相近，依序為：文王鼎_甲、寶尊_乙、夔鳳_丙、素洗_丁、雷紋爵_戊、叔朕簠_己、蟠夔壺_庚、蟠夔罍_辛、雷紋觚_壬、蟬紋簋_癸。⁹⁵這種排列方式與前引《欽定國子監志》「周範十器」的順序相同，與《西清古鑑》鼎、尊、罍、卣在前的排列次序相仿，表現清代以鼎、尊為上的古銅器鑑賞品評方式。

在「周範銅器十事」冊頁圖譜中，三禮為論述器物的基礎，《宣和博古圖》為器形、銘文的比對參考標準，呈現乾隆朝論述古器物的方式。如周伯彝的文字說明，先詳述尺寸、重量，再據禮書論述「按周禮六彝注彝亦尊也……」，接續與《宣和博古圖》對比，云：「《博古圖》有周伯英彝、叔彝，皆以為名字，茲器亦類……」，內容寫法及格式上，與《西清古鑑》相近。⁹⁶周木鼎的說明，以魯后木、楚子木解釋銘文「木」字，實來自《西清古鑑》〈周木卣〉說明中推翻《宣和博古圖》說法的創新闡釋。⁹⁷

以十件器物為一組，並配置器物圖冊及箱匣的做法，也是乾隆朝整理、陳設古代青銅器的創新。配置此類文物的最早紀錄為乾隆二十年（1755）開始集裝的「範金作則」銅器匣。以十件古代銅器為一組，每件器物配有木座，座上刻寫器名及天干號，以花梨木箱裝盛，木箱內放置器物的位置，都有對應每件銅器木座的腳槽。⁹⁸匣內並配有冊頁圖譜，包含十件銅器的器名、天干號、彩色圖繪、銘文內

93 (清)潘相，《曲阜縣志》，卷 10，頁 1-12。

94 (清)潘相，《曲阜縣志》，卷 10，頁 1-12；(清)孔尚祈，《聖門禮誌》，頁 62-63；(清)馮雲鵬、馮雲鶴，《金石索》，卷首，頁 3-22。

9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3，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五日〈廣木作〉，頁 23。

96 (清)潘相，《曲阜縣志》，卷 10，頁 5；(清)梁詩正等奉敕纂，《欽定西清古鑑》，卷 28，頁 30；卷 31，頁 88。

97 (清)潘相，《曲阜縣志》，卷 10，頁 2；(清)梁詩正等奉敕纂，《欽定西清古鑑》，卷 15，頁 38。

9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1，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一日〈匣作〉，頁 227。此套器物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十件一組的銅器匣及對應的瓷器匣配置過程，參見余佩瑾，〈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鑑賞〉，《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26-32。

容、說明及乾隆皇帝的印文，說明內容也援引甫刊刻完成的《西清古鑑》，表現當時內府古銅器鑑賞品評及收藏活動的樣貌。(圖 22)

內府經過編纂《西清古鑑》及配置寧壽宮古銅器，應對三代銅器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但三組孔廟銅器的實際年代卻落差大，有可能是刻意將較晚的銅器標示為周代。由國子監文廟及熱河文廟的「周素洗」看，國子監者為侈口折沿淺盤式，熱河文廟者為鼓腹、斂口、捲沿，肩部帶有雙環耳，形制上有一定的落差。張臨生已指出，國子監文廟「周素洗」腹淺，應是承盤而非洗。⁹⁹ 對照《西清古鑑》，相近的淺盤器如〈漢素洗六〉、鼓腹者如〈漢素盂六〉；¹⁰⁰ 《寧壽鑑古》一件無沿洗以周器稱之，有沿者則定為漢代，鼓腹帶環耳盆則均稱為漢洗。¹⁰¹ 成書於乾隆四十八（1783）至四十九年（1784）的《西清續鑑·甲編》中，同類鼓腹器均定為漢代。¹⁰² 二十一年（1756）集成的「觀象在鎔」銅器匣，也有一件相近器以「漢弦紋洗」為名。¹⁰³（圖 23）說明至少在配置熱河文廟銅器時，依當時的古銅器斷代知識，素洗的時代應被定為漢代。對比「西清四鑑」所載古銅器器類，在選配國子監文廟及熱河文廟的周代銅器群時，不採周代典型且著錄較多的盃、盤、匱、舟等，卻選擇素面無紋，且應為漢代的洗，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乾隆四十一年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孔廟禮器圖〉是現存最完整、器類最豐富的乾隆年間孔廟禮器圖之一。¹⁰⁴（圖 24）將國子監文廟、曲阜孔廟及熱河文廟的周代銅器群與〈孔廟禮器圖〉對照，可以看出這些銅器與地方孔廟祭器的對應關係。器名直接對應者，包括簋、簠、爵、犧尊、尊、壘、豆等。器形上，銅壺可能表現罐形的著尊，三足圓形的周木鼎表現圓鼎形的銅。方形的康侯鼎及文王鼎對應〈孔廟禮器圖〉中間的方鼎，觚對應插著靈芝的花瓶，素洗則可能對應銅質的毛血盤。乾隆皇帝頒賜國子監文廟的淺盤素洗，在器形上也可與《欽定國子監志》圓口淺盤形的毛血盤對應。¹⁰⁵

99 張臨生，〈真膺相糝的國子監周范十器〉，頁 50。

100（清）梁詩正等奉敕纂，《欽定西清古鑑》，卷 33，頁 51、69。

101（清）高宗敕纂，《寧壽鑑古》（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卷 13，頁 3-13。

102（清）王杰等奉敕纂，《西清續鑑·甲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卷 15，頁 21-35、45-47。

10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2，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廣木作〉，頁 186。

104 此圖見（清）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15-16，圖 8；馮明珠主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 31-32、88。

105（清）梁國治等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卷 19，頁 39。

毛血盤是進行瘞毛血儀式時，取牲血用的承盤。這一儀式由《禮記·禮運》而來，¹⁰⁶迄今仍為各地孔廟舉行釋奠祭儀的重要一環。¹⁰⁷但在宋代《三禮圖》的祭器系統，以及宋元的地方廟學釋奠系統中，均未列入此器，¹⁰⁸反而見於如宋徽宗敕編《政和五禮新儀》，用於皇帝祭祀地祇、太社及太稷的吉禮儀式。¹⁰⁹《明會典》及《明集禮》均有使用毛血盤瘞毛血的記載。¹¹⁰但毛血盤似非必要的祭器，如《明集禮》也有以豆取毛血的作法。¹¹¹毛血盤雖未列於《皇朝禮器圖式》，但仍是乾隆朝經常使用的祭器類型，除前述《欽定國子監志》繪有毛血盤，乾隆十二年《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太廟祭器中也有陶毛血盤。¹¹²《活記檔》有乾隆朝九江關燒造天壇、天神壇、地祇壇所用白瓷毛血盤的紀錄。在十五年（1750）關於製作太廟遵古改造祭器的紀錄中，九江關燒造進呈的祭器有白磁爵、尊，及未列於《皇朝禮器圖式》的毛血盤。¹¹³九江關監督唐英於十八年（1753）送到天神壇、地祇壇的白瓷祭器，除載於《皇朝禮器圖式》的豆、簋、簠、登、鉶等五種主要的瓷祭器，也列有白瓷毛血盤。¹¹⁴由此看來，毛血盤可能也是乾隆皇帝祭器改革之初考量的項目，但最終未列入禮器圖及《皇朝禮器圖式》。¹¹⁵

四、結語

本文分析乾隆朝《皇朝禮器圖式》遵古改造皇朝祭器的樣式來源，提出遵古改制祭器所依循的古代，是由儒家經典的文字說明闡釋意義，由宋代以來的廟學脈絡汲取古代祭器意象，再參酌明代禮器，並加入當代創新。相近的例子如李定恩所提

106《禮記·禮運》：「……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殼，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浣帛，醴醕以獻……」（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禮記註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21，頁22。

107孔德平、彭慶濤、孟繼新，《祭孔禮樂研究》，頁368-369。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 <https://www.tctcc.taipei/zh-tw/C/heritage/heritage/1%7C1/48.htm?1>（檢索日期：2019年6月25日）。

108感謝學友許雅惠教授提出宋至明代釋奠祭器中並無毛血盤，應進一步瞭解其使用背景的建議。

109（宋）徽宗敕編，《政和五禮新儀》，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81，頁8；卷82，頁2；卷86，頁7；卷87，頁2；卷91，頁2。

110（明）徐溥等奉敕纂，《明會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86，頁1-6；（明）徐一夔，《明集禮》，卷1，頁15。

111（明）徐一夔，《明集禮》，卷5，頁12。

112（清）乾隆皇帝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75，頁28。

11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7，乾隆十五年六月一日〈記事錄〉，頁290。

11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8，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七日〈記事錄〉，頁695-696。

115下令繪製禮器圖的時間點，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8，乾隆十六年二月十日〈如意館〉，頁337。

出的，十五世紀朝鮮王朝的世宗，以《釋奠儀圖》祭器為古制的依歸，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王朝祭器。¹¹⁶ 另一方面，對曲阜孔廟的關注，也帶來了將周代銅器置入皇帝親祀孔廟的改變。在這一作法下，內府的古代銅器陳設方式、鑑賞觀念影響了三套孔廟周代銅器器類的選擇及配件的製作。在皇帝親祀的三間孔廟，新制皇朝祭器與古代銅器共陳一室，改變了釋奠祭器陳設的面貌。如馮雲鵬觀看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的感想所示，影響了民間對古代銅器及祭器陳設的觀感及理解。

雍正朝因地方所請而為曲阜孔廟制訂的古式祭器，並未為地方孔廟所遵循。蔣元樞是乾隆皇帝身邊重要詞臣蔣溥之子，應對宮廷祭器有所瞭解。但當他為臺南孔廟購置祭器時，並未採取宮廷祭器樣式，而是如傅朝卿、廖麗君所指出的，依據如康熙年間《文廟禮樂考》的禮器圖式製作。¹¹⁷ 其中更包括模仿曲阜孔廟廢而不用漢五尊所製作的五尊陳設之器，並將之繪於〈孔廟禮器圖〉的中心。¹¹⁸

隨著《皇朝禮器圖式》的刊行，皇家祭器的形式在清晚期以後逐漸普及。如道光六年（1826）所造的湖南陶澍家祠銅禮器、¹¹⁹ 光緒二十八年（1902）浙江餘杭塘栖朱氏祠堂，¹²⁰ 以及如同治九年（1870）杭州府學祭器，¹²¹ 甚至是現代為臺南市孔廟製作的祭器，¹²² 都採用《皇朝禮器圖式》的祭器樣式。（圖 25）這套皇朝祭器如何廣泛進入民間視野，成為各地廟祠的祭器範本，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索。

〔後記〕本文為 106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重估『西清四鑑』：乾隆時期的古銅認知研究」（MOST106-2410-H-136-005-MY2）研究成果之一，初步成果發表於 2019 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主辦「皇朝禮器研討會」，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赴北京及山東考察，得到了國立故宮博物院

116 李定恩，〈《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制定背景與朝鮮初期禮制藝術之形成〉，頁 99-174。

117 傅朝卿、廖麗君，《全台首學臺南市孔子廟》，頁 115-119。

118 〈孔廟禮器圖說〉依器物功能分，五尊為：「陳設之器曰泰尊、犧尊、象尊、山尊、雷尊」。但五尊的形制與曲阜孔廟者有別。（清）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15-16、圖 8；馮明珠主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31-32、88。

119 陳建明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頁 186-193。

120 浙江省博物館編，《越地范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頁 117-119。

121 浙江省博物館編，《越地范金》，頁 114、116。

122 現代祭器綑的形式均採《皇朝禮器圖式》樣式。見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2011），頁 63、67。

108年「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的經費支持。本研究是在學友施靜菲教授的鼓勵下進行，過程得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山東曲阜孔子博物館以及許多友人的慷慨協助。事成後承蒙兩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筆者獲益良多，進行了大幅改寫。在此致以由衷感謝。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漢) 鄭玄註，(唐) 孔穎達疏，《禮記註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漢) 鄭玄註，(唐) 陸德明釋文，《纂圖互註周禮》，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宋) 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宋) 呂大臨，《考古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宋) 徽宗敕纂，《政和五禮新儀》，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宋) 聶崇義，《三禮圖集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明) 李楫修，莫旦纂，《成化新昌縣志》，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 106》，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 (明) 徐一夔，《明集禮》，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明) 徐溥等奉敕纂，《明會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明) 陳鎬，《闕里志》，收入吳平等主編，《中國祠墓志叢刊 21》，揚州：廣陵書社，2004。
- (清) 允陶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清) 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清) 允祿等奉敕纂，《欽定儀禮義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2006。

(清)孔尚忻，《聖門禮誌》，據光緒十三年曲阜孔氏硯寬亭重刻本影印，收入丁鳳麟等主編，《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第3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卷116。

(清)王杰等奉敕纂，《西清續鑑·甲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

(清)杜詔、岳濬，《山東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清)沈初，《西清筆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八九）》，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清)和珅等奉敕纂，《欽定熱河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清)拖律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圖》，收入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冊21。

(清)金之植、宋鈞，《文廟禮樂考》，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清)高宗敕纂，《寧壽鑑古》，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

(清)梁國治等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清)梁詩正等奉敕纂，《欽定西清古鑑》，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清)馮雲鵬、馮雲鶴，《金石索》，據道光元年刊本影印，臺北：德志出版社，1963。

(清)潘相，《曲阜縣志》，據乾隆三十九年刊本影印，收入《新修方志叢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清)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馮明珠主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近代論著

上海博物館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上海博物館，2012。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12·明（上）》，臺北：錦繡出版社，2001。

孔德平、彭慶濤、孟繼新，《祭孔禮樂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王光堯，〈清代瓷質祭禮器略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2期，頁70-78。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敬天尊祖 禮樂備和：天壇館藏文物精選》，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

版社，2018。

- 余佩瑾，〈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鑑賞〉，《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14-40。
- 李定恩，〈《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制定背景與朝鮮初期禮制藝術之形成〉，《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4 期，2018 年 3 月，頁 99-174。
- 徐琳，〈故宮博物院藏齊家文化玉璧綜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 年 3 期，頁 137-151。
- 浙江省博物館編，《越地范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
- 國寶法蘭西之旅編委會編，《國寶法蘭西之旅：赴法『中國文化年』文物展覽精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張小李，〈略論清代太廟祭器、祭品陳設規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 年 3 期，頁 65-75。
- 張作耀，《大哉孔子》，香港：和平圖書公司，1991。
- 張榮、劉淨賢，〈「西清四鑑」的成書、版本及流傳〉，收入《西清古鑑今訪·北京故宮博物院卷》，紐約：胡盈瑩與范季融基金會，2020，頁 474-487。（待刊）
- 張臨生，〈真膺相糝的國子監周範十器〉，《故宮文物月刊》，73 期，1989 年 4 月，頁 34-55。
- 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4 期，2003 年 3 月，頁 1-26。
- 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 期，2012 年 3 期，頁 103-170。
- 郭家彥（Iain Clark），《皇朝禮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
- 陳芳妹，〈蔣元樞與臺灣府學的進口禮樂器〉，《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3 期，2013 年春季，頁 123-184。
- 陳芳妹，〈發掘初期「安陽」文物的國際性移動——以羅振玉贈日本湯島聖堂的禮物為例〉，收入陳光祖主編，《金玉交輝——商周考古、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 117-161。
- 陳芳妹，〈宋代「金學」的興起與宋代仿古銅器〉，收入氏著，《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1-91。
- 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釋奠儀式」的形成及影響〉，收入氏著，《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191-255。
- 陳芳妹，〈雍正帝贈送曲阜孔廟的祭器——畫琺瑯五供與銅簠簋〉，《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1 期，2020 年 3 月，頁 73-142。
- 陳建明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北京：中華書局，2013。
- 陸鵬亮，〈公主的銅器——元代全寧路祭器小考〉，《故宮文物月刊》，404 期，2016 年 11 月，頁 18-26。

- 傅朝卿、廖麗君，《全臺首學臺南市孔子廟》，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0。
-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2011。
- 劉澐，〈一部規範清代社會成員行為的圖譜——有關《皇朝禮器圖式》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4期，頁130-144。
- 鄧淑蘋，《乾隆皇帝的智與昧》，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
- 謝志杰、王虹光，〈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簡報〉，《南方文物》，1992年2期，頁1-7。
- 蘇榮譽、周亞、艾素珊（Susan Erickson），〈宋代銅豆初探〉，收入陳建明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249-265。
- Chavannes, Édouard.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Ernest Leroux, 1909.
- Lawton, Thomas. "An Imperial Legacy Revisited: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Qing Palace Museum," *Asian Art* 1:1 (1987/1988): 51-79.
- Maucuer, Michel. *Bronze de la Chine Impériale des Song aux Qing*. Paris: Paris-Musées, les musées de la Ville de Paris, 2013.
- Yu, Hui-chun.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圖版出處

- 圖 1 清，雍正八年（1730）所造頒賜曲阜孔廟的祭器，孔子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2 周代銅簠。a 東周，蟠虺紋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鉅中簠〉，宋，呂大臨，《考古圖》，卷 3，頁 41，明萬曆二十八年鄭樸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 釋奠儀祭器與《皇朝禮器圖式》祭器。a 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頁 29、31、33、34、44，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明，陳鎬，《闕里志》，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刊本，卷 2，頁 3。收入吳平等主編，《中國祠墓志叢刊》（21）。c 明，李楫修，莫旦纂，《成化新昌縣志》，卷 1，頁 6，上海圖書館藏。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106）。d 清，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頁 5、6、7、8、12、14，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e 清，乾隆朝銅祭器，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作者攝。
- 圖 4 〈簠〉，明，徐一夔，《明集禮》，卷 2，頁 37，明嘉靖九年內府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5 西周晚期銅器。a 西周晚期，饒季獻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西周晚期，鄂侯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6 銅豆。a 元，湖南瀏陽文靖書院豆，湖南省博物館藏。陳建明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頁 173。b 明，成化二十一年銅豆，孔子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7 爵。a 元，湖南瀏陽文靖書院爵，湖南省博物館藏。陳建明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頁 182。b 明，永樂，青花波濤龍紋爵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8 禮器圖中的銅。a 〈銅鼎〉，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 13，頁 18a，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薈要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銅〉，明，徐一夔，《明集禮》，卷 2，頁 41a，明嘉靖九年內府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c 〈銅〉，清，金之植、宋鈞，《文廟禮樂考》，〈禮部〉，頁 41。
- 圖 9 《皇朝禮器圖式》太廟用尊。清，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2，頁 11、13、17，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0 曲阜孔廟漢代五尊，孔子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11 圖籍中的玉璧。a 〈夕月壇正位白璧〉、〈天壇正位倉璧〉，清，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頁 1、51，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璧〉，宋，呂大臨，《考古圖》，卷 8，頁 6b-7a，明萬曆二十八年鄭樸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c 〈穀璧〉，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 10，頁 11a，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薈要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2 玉禮器。a 明，玉璧，定陵博物館藏。感謝鄧淑蘋研究員提供圖像。b 明，定陵玉琮，定陵博物館藏。感謝鄧淑蘋研究員提供圖像。c 清，赤壁，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作者攝。d 清，玉琮，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作者攝。

- 圖 13 圖籍中的玉琮。a〈地壇正位黃琮〉，清，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頁 22，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大琮〉，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 10，頁 18a，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薈要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4 匏爵。a〈天壇正位匏爵〉，清，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頁 2，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清，乾隆，匏爵，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作者攝。
- 圖 15 國子監文廟「周範十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6 〈周康侯鼎〉，清，梁國治等奉敕纂，《欽定國子監志》，卷 46，頁 3，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7 〈大成殿正位陳設〉，清，拖律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圖》，清嘉慶二十三年武英殿刊本。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21)，頁 428-429。
- 圖 18 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孔子博物館藏。採自 É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l. cccxcv，並調整次序。
- 圖 19 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木案及案面局部，孔子博物館藏。感謝孔子博物館授權使用，並提供木案彩圖。
- 圖 20 熱河文廟銅器。清，和珅等奉敕纂，《欽定熱河志》，卷 74，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1 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圖。a〈周木鼎甲〉、〈周蟠夔敦己〉，清，潘相，《曲阜縣志》，乾隆三十九年刊本，卷 10，頁 2、7。b〈木鼎甲〉，清，馮雲鵬、馮雲鵠，《金索》，卷首，頁 2。
- 圖 22 〈範金作則〉冊頁圖譜中的〈周史尊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3 清宮著錄收藏的銅洗。a〈漢素洗六〉，清，梁詩正等奉敕纂，《欽定西清古鑑》，卷 33，頁 37a，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周素盤三〉，清，王杰等奉敕纂，《西清續鑑·甲編》，卷 15，頁 9，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c「觀象在鎔」銅器匣「漢弦紋洗」及圖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d.〈漢素盂六〉，清，梁詩正等奉敕纂，《欽定西清古鑑》，卷 33，頁 52a，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e.〈漢弦紋洗三〉，清，王杰等奉敕纂，《西清續鑑·甲編》，卷 15，頁 34，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4 〈孔廟禮器圖〉。清，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5 依《皇朝禮器圖式》祭器樣式製作的廟祠祭器。a 道光六年湖南陶澍家祠銅銅，湖南省博物館藏。陳建明編，《復興的銅器藝術—湖南晚期銅器展》，頁 190。b 同治九年，杭州府學祭器，浙江省博物館藏。浙江省博物館編，《越地范金》，頁 116。c 光緒二十八年，浙江餘杭塘栖朱氏祠堂，浙江省博物館藏。浙江省博物館編，《越地范金》，頁 117。d 民國三十七年，臺南孔廟銅銅，臺南市孔廟藏。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頁 63。感謝黃翠梅教授授權使用，並提供圖像。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itual Vessels from the Qianlong Court

Wu, Hsiao-yu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1747, the Qianlong emperor reflected on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ritual vessels from the Ming dynasty and continued to follow the Yongzheng emperor in presenting archaic-style ritual vessels to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Qufu, in the process adapting Qing imperial ritual vessels to conform with those of antiquity. In examining related textual evidence, it becomes clearly evident that these ritual vessels reportedly based on Confucian ritual classics of the Zhou dynasty are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Zhou dynasty bronzes we know today, archaistic ritual vessel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ose found in illustrated catalogs of bronzes. This was coincidentally the time when the Qianlong emperor was examining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ancient bronzes and beginning to compile the *Xiqing gujian* catalog, though there is no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 forms of Zhou dynasty bronzes were consul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ritual vessels. What was the source of the archaic style that Qianlong emperor adapted to his ritual vessels? Did the numerous ritual vessels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of high antiquity at the court influence ritual vessels or the rites?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the present study seeks to address.

The present research analyzes the ritual vessels presented by the Yongzheng emperor to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Qufu and the ritual vessels adapted to conform to antiquity made in the reig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antiquity upon which the latter was based actually followed the idea of the explanation provided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imagery of ancient ritual vessels gained from the Confucius temple and school system, and some elements from Ming dynasty ritual vessels along with some new innovations of the time. Furthermore, focus on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Qufu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the placement of Zhou dynasty bronzes in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for the personal sacrifices of the emperor. The present study traces the production of three sets of bronzes gifted to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demonstrating an appreciation and knowledge of ancient bronzes in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as well as how the method of display influenced the choice and production of

accessories for the three sets of bronzes. This in turn changed the appearance of displays for ritual vessels used in the Confucius Memorial Ceremony.

Keywords: Qianlong emperor, ritual vessels, ancient bronzes, Temple of Confuciu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 1 清 雍正八年所造頒賜曲阜孔廟的祭器 孔子博物館藏
由左至右：簋、銅、爵、豆、簋



a 東周 蟠虺紋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弅中簋〉 宋 呂大臨 《考古圖》 明萬曆二十八年鄭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周代銅簋

器類	a 宋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b 明 《闕里志》	c 明 《成化新昌縣志》	d 清 《皇朝禮器圖式》	e 清乾隆朝銅祭器
簋					
簋					
豆					
銅	無		無		
爵					
竹編的籩					

圖3 釋奠儀祭器與《皇朝禮器圖式》祭器

a 宋 朱熹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明 陳鏞 《闕里志》 明萬曆三十五年刊本

c 明 李楫修、莫旦纂 《成化新昌縣志》 上海圖書館藏

d 清 允祿等奉敕纂 《皇朝禮器圖式》 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 清 乾隆朝銅祭器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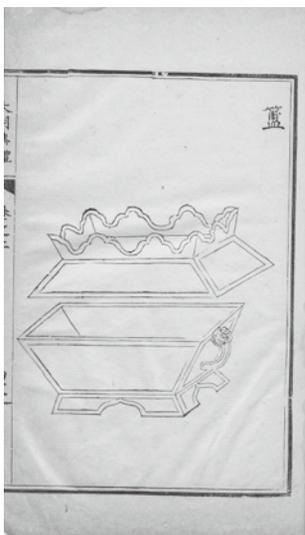


圖4 〈簠〉 明 徐一夔 《明集禮》 明嘉靖九年內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西周晚期 譏季獻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西周晚期 鄂侯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西周晚期銅器



a 元 湖南瀏陽文靖書院豆 湖南省博物館藏



b 明 成化二十一年 銅豆

圖6 豆



a 元 湖南瀏陽文靖書院爵 湖南省博物館藏



b 明 永樂 青花波濤龍紋爵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7 爵



a <鉶> 宋 聶崇義 《三禮圖集注》
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叢要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鉶> 明 徐一夔 《明集禮》
明嘉靖九年內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c <鉶> 清 金之植、宋縱 《文廟禮樂考》

圖 8 禮器圖中的鉶



〈太廟正殿犧尊〉

〈太廟正殿象尊〉

〈太廟正殿山尊〉

圖9 《皇朝禮器圖式》太廟用尊 清 允祿等奉敕纂 《皇朝禮器圖式》 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銅山尊



陶大尊



銅雷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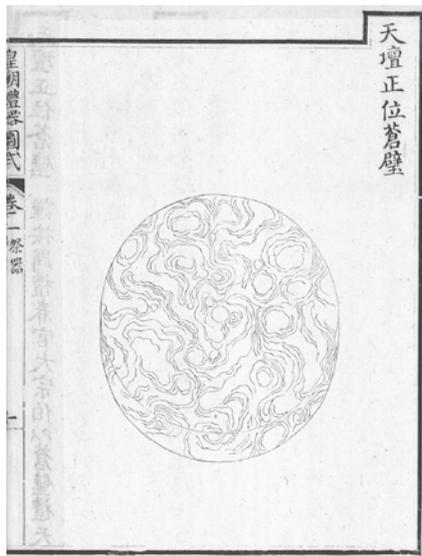


銅犧尊



銅象尊

圖10 曲阜孔廟漢代五尊 孔子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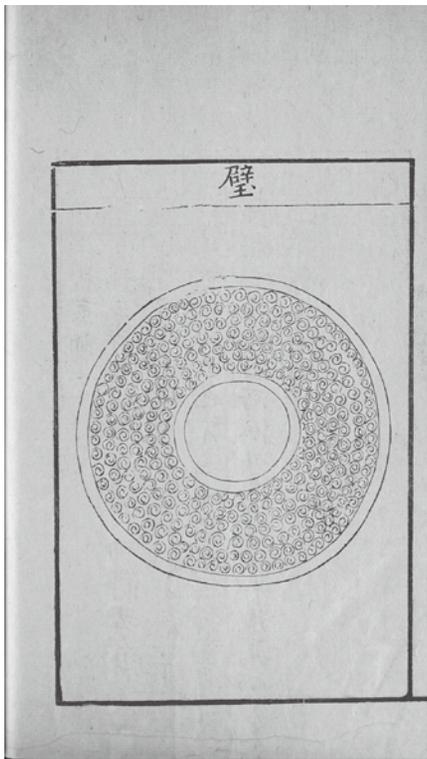


〈夕月壇正位白壁〉

a 清 允祿等奉敕纂 《皇朝禮器圖式》

〈天壇正位倉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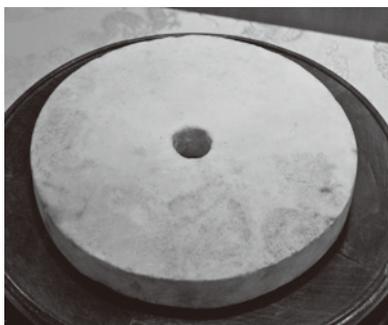
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璧〉 宋 呂大臨 《考古圖》 明 萬曆二十八年鄭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c 〈穀璧〉 宋 聶崇義 《三禮圖集注》 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薈要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 圖籍中的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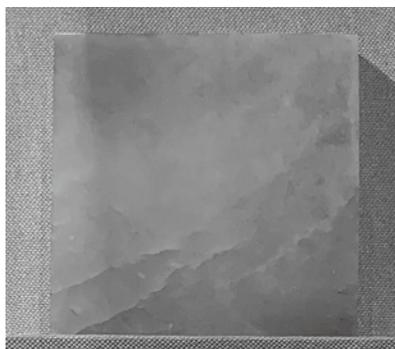
a 明 玉璧 定陵博物館藏



b 明 玉琮 定陵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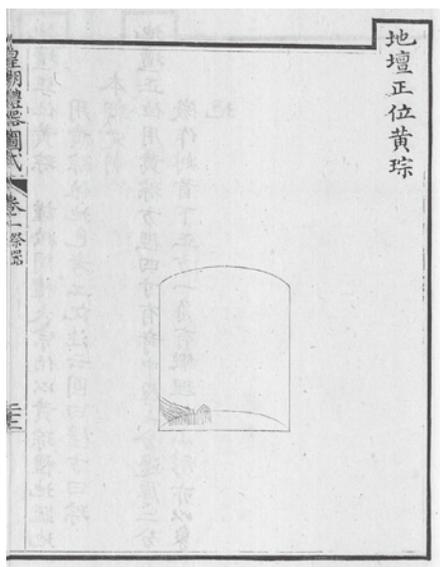


c 清 赤壁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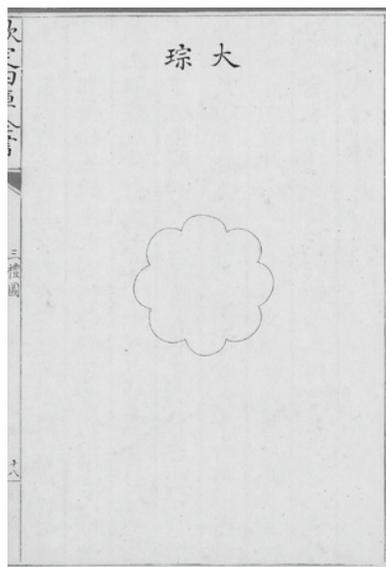


d 清 玉琮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

圖 12 玉禮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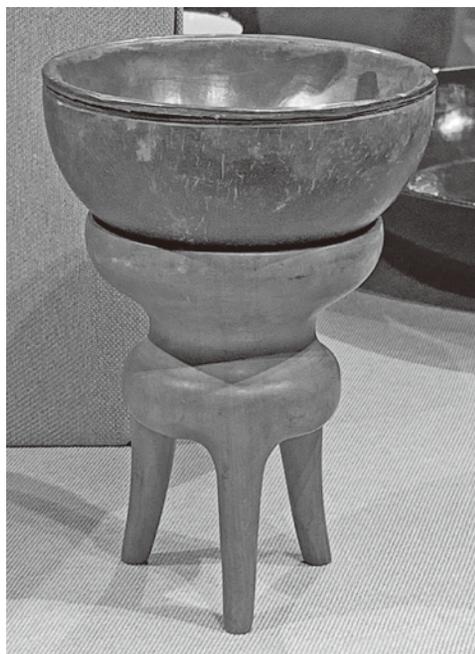


a 〈地壇正位黃琮〉 清 允祿等奉敕纂
《皇朝禮器圖式》 清乾隆三十一年武
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大琮〉 宋 聶崇義 《三禮圖
集注》 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薈要
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圖籍中的玉琮



a 〈天壇正位匏爵〉 清 允祿等奉敕纂 《皇朝禮器圖式》 清乾隆三十一年 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清 乾隆 匏爵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

圖 14 匏爵



圖 15 國子監文廟「周範十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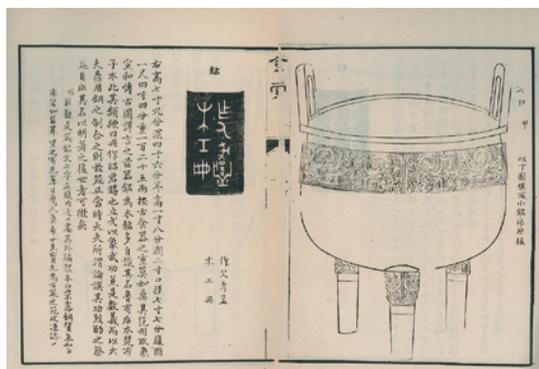
圖 19 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木案及案面 局部 孔子博物館藏



圖 20 熱河文廟銅器 清 和珅等奉敕著《欽定熱河志》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周木鼎甲〉、〈周蟠夔敦己〉 清 潘相 《曲阜縣志》 乾隆三十九年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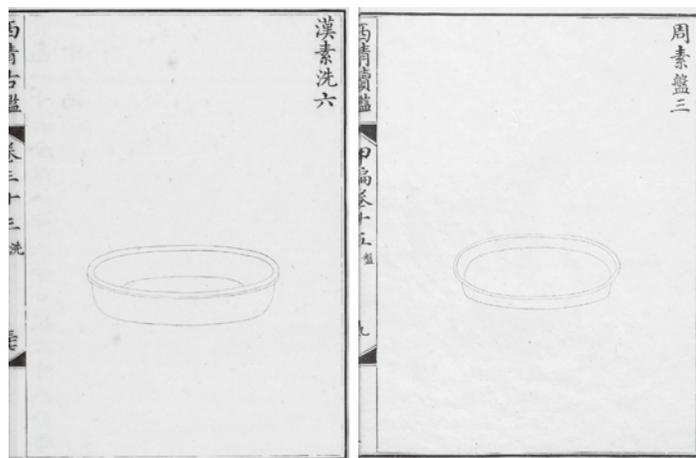


b 〈木鼎甲〉 清 馮雲鵬、馮雲鸞 《金索》 道光元年刊本

圖 21 曲阜孔廟「周範銅器十事」圖



圖 22 〈範金作則〉冊頁圖譜中的〈周史尊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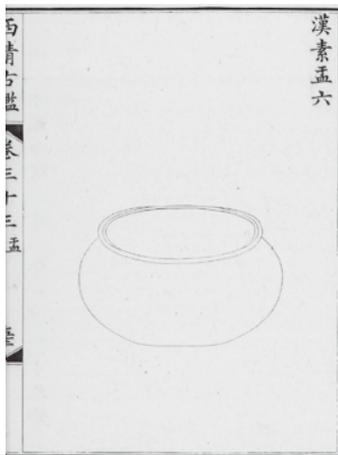


a 《西清古鑑》〈漢素洗六〉

b 《西清續鑑·甲編》〈周素盤三〉



c 「觀象在鎔」銅器匣 「漢弦紋洗」及圖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d 《西清古鑑》〈漢素盂六〉



e 《西清續鑑·甲編》〈漢弦紋洗三〉

圖 23 清宮著錄收藏的銅洗



圖 24 〈孔廟禮器圖〉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道光六年湖南陶澍家祠銅
銅湖南省博物館藏



b 同治九年杭州府學祭器
浙江省博物館藏



c 光緒二十八年浙江餘杭塘栖
朱氏祠堂 浙江省博物館藏



d 民國三十七年臺南孔廟銅銅 臺南市孔廟藏

圖 25 依《皇朝禮器圖式》祭器樣式製作的廟祠祭器